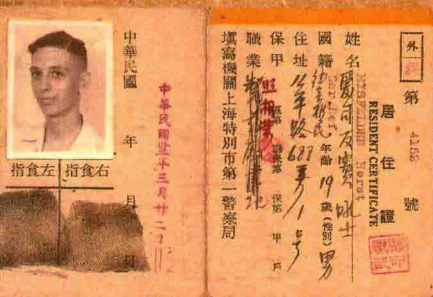


中国犹太问题研究专家潘光 倾情作序
犹太难民后裔沙拉·伊马斯 推荐



Escape and Rescue

Jewish Refugees and Shanghai in World War II

逃亡与拯救



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

王健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

Escape and Rescue

Jewish Refugees and Shanghai in World War II

逃亡与拯救

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

王健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全书立足广阔的国际背景,通过难民群体视角,凭借口述回忆、报刊记载、档案资料等珍贵史料再现了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东方一页,凸显了上海以及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弘扬了中国人民友善宽容的情怀和爱好和平的传统。

全书史料扎实、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故事感人,对何凤山的“生命签证”、犹太难民的人数、虹口犹太隔离区设立因由等进行了考证和探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优秀历史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亡与拯救: 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 / 王健著.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13-13962-7

I. ①逃… II. ①王… III. ①犹太人—难民—史料—
上海市—现代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804 号

逃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

著 者: 王 健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21-64071208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印 张: 20.5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3962-7/K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6482128

序

仔细读了王健的这本新著，我感到十分高兴，不仅是为这本书而高兴，更是为我们的犹太研究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感到由衷地高兴。

20世纪90年代，我曾将王健称为我们犹太研究中心涌现出来的新秀中的“佼佼者”。到2008年，我为他的力作《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写序时，则认为他已“成为犹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知名学者”。此后这些年来，他推出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的著作，越来越证明“成果丰硕”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同时，“新秀”和“佼佼者”这样的桂冠应该让给更年轻的学者了，如我们犹太研究中心的年轻副教授汪舒明博士和王震博士。这样一种新人不断涌现的盛景，怎能不使我倍感欣喜？

虽然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的著作已经不少，但王健这本新作仍有几个显著的特色。

其一，讲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国内外推出了许许多多纪念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幸存70周年的著述和文艺作品，但往往只讲从1938年到1945年发生的事，而没有涉及上千年犹太人来华和1840年后犹太人来沪的历史大背景，结果使读者仍然搞不清一

些问题,如“为什么犹太人跑到这么远的上海来避难”等。本书与此不同,具有较高的历史专业水准,将从古至今犹太人来华、来沪,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犹太人来中国又形成新的高潮都做了详细介绍,使读者对这一难忘历史篇章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其二,叙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推出的许多关于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和中犹友谊的作品有两个倾向:一是纯学术研究,一般读者不易看懂;二是文艺化,甚至娱乐化,结果一些内容违背历史事实,甚至不符合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人啼笑皆非。本书则将学术性和通俗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做了严谨的学术分析,又非常通俗易懂,将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形式奉献给读者,可以说是公众史学的成功范例,也体现了作者具有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文字通俗表述能力。

其三,观点鲜明独到、有根有据。比如关于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从1933—1941年12月,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总计约3万人,除去在沪短期逗留后又赴第三地的人员,在沪长期避难的犹太难民约为2万5千人。但是,一些当年进入虹口的犹太难民却认为来沪避难的犹太人不到2万。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没有把他们自己来沪之前,即从1933—1937年来沪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二是没有把经上海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三是没有把留在虹口隔离区以外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四是基本上没有阅读、研究中

文史料。对这个问题,本书作者并没有回避,也不是停留在一般争论上,而是对当年中外报刊和文献上关于抵沪犹太难民人数的第一手报道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详细考察,并在书中一一列出。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发表的《1940年年报》中得到了一个关键性数据: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助的犹太难民已超过2万3千人。作者认为,如再加上众所周知于1941年来沪的数千波兰、立陶宛等地犹太难民,战争期间在沪避难的犹太难民总数无疑超过了2万5千人。这个数字与国际大屠杀研究的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也是一致的。根据这个数字,再加上1933—1941年间经上海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总计约3万人也是毫无疑问的。作者在这类有争议的问题上观点鲜明,又能摆事实讲道理,确实令人信服。据了解,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是否符合事实,作者还直接通过电子邮件与当年在沪的犹太难民和相关学者进行交流,并专程去柏林拜访当年来沪的犹太难民,这样严谨的学风是值得赞许的。

其四,史料细致入微、全面翔实。即使像我这样研究来华、来沪犹太人数十年的专业人士,也在本书中发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史料。如上海犹太难民的文化生活及其在上海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等方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犹太难民直接前往或经上海前往哈尔滨、天津、青岛、大连、重庆等城市的情况;奥地利犹太难民中弗洛伊德的一批学生,特别是犹太医生韩芬教授对中国精神学和神经学教学科研的贡献以及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又前往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或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

活动，等等。以前对这些事情有所听闻或略知一二，但这次在书中却能找到详细的材料，可见作者确实在收集资料方面花费了不少功夫。以如此细致、翔实的材料来讲述来华、来沪犹太人的历史，一定也会使读者获益匪浅。

需要一提的是，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王健教授则是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五年多来，他为这个项目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出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本书就是其中成果之一。因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要特别指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热潮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了一批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特别是中国人民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友谊的图书，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国际影响，本书就是其中一种。在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潘 光

2016年1月4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前 言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在战争期间，拯救了约3万名遭到纳粹迫害而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难民。

面对“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各国政府大多仅止于口头谴责，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进行救助。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共有32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中各个国家均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出于对自身经济、外交等因素的考虑，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1939年英国发表了“5.17”白皮书，意味着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而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并没有扩大移民配额。1939年5月，美国政府甚至将载有900多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导致其中绝大多数最后惨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940年和1941年，美国国会又相继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州和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议案。

尽管各国政府的态度令人失望，但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很多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国际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在战争状态下，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仍能进入交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因而他们在营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方面往往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抱有宗教偏见，但当纳粹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公开声援犹太人。在法国、荷兰、比利时，教堂往往成为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场所；“二战”爆发后，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也都积极参与了营救犹太人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其中就包括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

当时，虽然中国人民身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害之中，流离失所、生活困难，但仍然关心着远在欧洲的犹太难民。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1939年2月，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提议在中国云南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上海，这座同样遭到战火摧毁的东方大都市，从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接纳了近3万欧洲犹太难民，除去部分人经上海去往其他城市和国家，至少有2.5万人一直留在上海生活直至战争结束。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总数还多。中国其他城市，如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香港等也在此期间接纳安置了一定数量的欧洲犹太难民。

1945年8月，这些犹太难民经过漫长的等待和痛苦的煎熬，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虽然与昔日在欧洲的生活相比，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存充满艰辛，但当他们战后寻找欧洲亲人，得知其他犹太难民的遭遇时，另外一种更为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曾经以为生活在地狱的他们发现上海才是天堂，而给予他们这一战时天堂的，就是友善、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的上海市民。抗战期间，上海市民处境十分困难，但依然无私地给予欧洲犹太难民鼎力相助。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这段有关拯救的历史，不仅是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东方一页，也是大屠杀历史中的独特记忆，是关于人类热爱和平的宝贵精神财富，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完整地保存、整理、研究并传之后人，让人们永远牢记在“二战”期间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一抹人道主义的亮光和暖色，不仅有利于彰显人道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中国人民友善宽容的情怀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理解。

然而，时光的流逝，历史资料的散失，特别是当年幸存的犹太难民正在逐渐离世，如何加紧保护性的资料抢救，如何进一步

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如何讲好中犹共同抵抗法西斯暴行，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动人故事，就成为我们这一代学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2015年3月，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提出这一选题后，我与常务副总编刘佩英女士、社科项目部主任钱方针女士商议，我们不仅要从历史资料中进一步挖掘新材料，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应该更多地加入口述采访和难民回忆，通过犹太难民来讲这段拯救历史和这段历史对他们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例如，有关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观点，犹太难民中也有不同说法，甚至有些人指责中国夸大了数量。根据当时上海犹太人办的《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统计，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知所有领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登陆时，工部局官员就表示，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仍然有欧洲犹太难民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已达23310人。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此后，几乎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洲大陆前来上海。但是，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在2000以上。此外，不少犹太难民来到上海

后因种种原因前往了其他城市和国家。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等城市都各接纳了200~300犹太难民。1939年2月的一项统计显示,有2500名犹太人从上海来到香港,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但是“二战”爆发后,由于英国对德宣战,竟然又将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驱赶到上海。1940年有102名德国犹太难民经西贡前往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与纳粹作战。1941年下半年,有29名波兰犹太难民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拓殖工作。因此,“二战”期间,中国接纳了3万左右犹太难民,其中至少有2.5万生活在上海。

又如,对于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声称是日本人救了他们,日本一些媒体对这段历史甚至有夸大美化的倾向。应该说,出于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迫害犹太难民。事实上,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12月至1939年6月,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并就吸引犹太人来华开发“河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河豚鱼计划”的指导下,日本当局起初并没有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采取限制措施。1939年7月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的犹太难民实施了限制。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限制令颁布前，日本当局就于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并希望改变相关规定。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并严格限制许可证的发放。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日本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于敌侨的管理方式，限制其自由并加以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重新评估与世界犹太民族的关系。虽然按照希特勒“最终解决”思想精心炮制的“梅辛格计划”没有成功实施，但日本当局考虑到与德国的关系和自身的利益，加紧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监管。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作为一种军事职责，日本上海当局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美、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制迁入隔离区生活。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遭到了上海犹太人的竭力抵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犹太难民已经充分感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和威胁。

再如，有些人指出，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

民，犹太难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中国人的拯救。的确，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也沦为难民，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的支持，此时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了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在生活于上海的400万中国人眼中，犹太难民都是受害者，因而应该给予他们援助。中国人自己已有80万难民，他们为逃避中日战争而避难于上海，其中有12万人由租界负担日常生活。尽管中国人自己也生活在一种凄惨的贫穷潦倒之中，但他们并未感到数千名西方人的到来会成为某种威胁。”犹太难民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上海，我们并没有因为是难民而受到歧视，相反当地居民对我们一向很友好。我们相处得很好。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很舒服。有时候也会互相帮帮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我们犹

太人在上海通常只买最便宜的东西，但中国人很照顾我们，往往允许我们赊账。其实相比中国难民，我们犹太难民的生活算是好的。那时上海的中国人备受日本人压迫，很穷很穷，他们很多人以做苦工为生，过地简直不是人的生活。”“他们友好、乐于助人，并颇为自豪地为我们服务。在新居住下来后，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大多数犹太难民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我们很幸运，毕竟我们是在他们的领土上生存。我们和中国邻居虽然称不上至交，但都懂得礼尚往来，例如我母亲给中国邻居一块面包，他马上会回送给我一支铅笔。”“中国邻居对我们很好，他们很同情我们。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他们自己也是难民。”外国学者的这些观点，特别是犹太难民自己的回忆应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东方的亲戚”，主要讲述近代以前中犹两个民族的交往，特别是开封犹太社区的兴衰和犹太难民来华之前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第二章“逃离纳粹迫害”，全面分析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及其发展，以及欧洲犹太人对纳粹反犹政策的认识和“水晶之夜”后的大量外逃。同时描述了中国人民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抗议和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义举。第三章“上海方舟”，详尽论述了上海在抗战爆发后的

特殊状态,犹太难民的艰难旅程,抵达上海的情况以及相关救援安置。同时,也介绍了上海之外其他中国城市对犹太难民的接纳。第四章“寻求新生活”,生动描绘了犹太难民安顿下来后自食其力,开始寻求新生活的努力,特别是将遭到战争破坏,市场凋敝的提篮桥地区建成了具有故国风情的“小维也纳”。第五章“虹口隔都”,着重分析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政策的变化,“梅辛格计划”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当局建立虹口隔离区的动因。第六章“文化生活”,全面介绍了犹太难民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活以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犹太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七章“互伸援手”,详尽论述了“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深陷危境的欧洲犹太难民的关注、同情、声援和支持,以及在华犹太人,包括上海犹太难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的独特贡献。第八章“再见,避难地”,客观分析了犹太难民在上海迎来“二战”胜利后的心情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念。第九章“上海情结”,全面论述了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后对上海的独特情感和网络联结,对上海,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以及上海和世界对“上海犹太难民”这一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视、挖掘和传播。

逃亡与拯救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东方的亲戚 · 001
- 第二章 逃离纳粹迫害 · 017
- 第三章 上海方舟 · 045
- 第四章 寻求新生活 · 125
- 第五章 虹口隔都 · 169
- 第六章 文化生活 · 195
- 第七章 互伸援手 · 221
- 第八章 再见,避难地 · 269
- 第九章 上海情结 · 285
- 后记 · 306